

在矛盾的开放性空间构筑理论：

生态批评及生态恐惧

[加拿大] 西蒙·埃斯托克

使生态批评阐释范围得以普及和拓展的因素，在某些方面似乎也使生态批评免受许多后结构主义思潮的挑战。在环境日趋恶化、危机四伏之情形的推动下，生态批评深受读者广泛而热情的欢迎。它坚决否定蒙昧主义，提倡接触美学，寻求和支持一种即刻性和直接性。这种新学说令人目眩，但在总体上又不是很见成效。^[1] 尽管它的内部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矛盾，但其批评空间仍具有相当大的开放性。^[2] 在此空间 [彼得·魁格利 (Peter Quigley) 称之为“危险空间”] 里去建构理论是有一点冒险的，因为它有可能会威胁到生态批评群体内部的平静。泰瑞·吉福德 (Terry Gifford) 曾敏锐地指出，“生态批评之所以没有发生引人注目的理论争鸣是因为缺乏一种方法论的引导”^[3]。也许他是正确的。目前虽有很多不满的声音，但这些声音常常被正统的生态批评体系所忽略或根本得不到机会去阐述。^{[4][5]} 其实，越是谈论自然，我们就越能清晰地认识到：生态批评不仅需要能与其它学科相互渗透的领域，还需要更多明确的结构体系、批评方法和可行的术语；越是谈论自然，我们就越清晰地认识到：有必要讨论“人类是如何一步步蔑视自然”这个可界定和可辨认的过程（或许可以称之为“生态恐惧”，这一术语在一个

[1] 约翰·陶玛哲 (John Tallmadge) 和已故的亨利·哈里顿 (Henry Harrington) 极其简洁地警告说，要注意那些已变得“晦涩和特异的”理论，而劳伦斯·布伊尔 (Lawrence Buell) 所担心的则是他所称作“文学理论所引起的催眠状态”。

[2] 我从瑟皮尔·奥珀门 (Serpil Oppermann) 颇有争议的《将生态批评理论化》一文中获取了“矛盾的开放性”这一术语。

[3] Terry Gifford, “Recent Critiques of Ecocriticism”, *New Formations: A Journal of Culture/Theory/Politics*, 64 (Spring 2008), p. 15.

[4] 劳伦斯·布伊尔也尖锐地指出，生态批评缺乏一种方法论。他在 1999 年声称生态批评没有“像爱德华·赛义德 (Edward Said) 的《东方主义》(对殖民话语的研究) 或史蒂芬·格林布拉特 (Stephen Greenblatt) 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新历史主义的研究) 一样有典范式的开山之作”。

[5] 当然，对生态批评内部没有论战的观点并不是受到一致认可的。早在 1997 年，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上，詹妮弗·瓦伦斯 (Jennifer Wallace) 就评论说，生态批评“已经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学术争论”。在此，瓦伦斯指的是艾伦·刘 (Alan Liu) 的评论“没有自然，只有历史”的挑战，而这也正是我们在此所关注的，部分是因为刘在很多方面所提出的有关认可和理论化的质疑，生态批评迄今为止还没有做出回答。

博客中提早地被称作“范例”)。^[6]在生态批评家中不乏矛盾和冲突,把“生态恐惧”理论化应该不会加深其矛盾,反而会带来各种理论的相互融合,从而实现一些生态批评家所追求的对于生态批评进行某种方法论或理论体系的确定。

生态批评内部的相对平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因为学术理论的争鸣在学术界似乎已成为一种规则,无一例外。吉福德曾指出:自1995年在福特考林斯举办的第一届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ASLE)会议后的十年内,生态批评一直“缺乏一种激烈的内部争论”。^[7]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事实上,争论已经产生了。一方面,学者们希望与其“和睦相处”,看到了“接触联系”的重要性,^[8]认识到了此时此刻的紧迫性,以及“对于真实之复兴”^[9]的必要性。学者们希望避开对生态批评具体含义的争论去从事生态批评,^[10]幻想“逃脱在当今文学理论形成过程中那种令人痛苦的、内行才懂的抽象”,^[11]想要免除格林·洛夫(Glen Love)所担心的“后结构虚无主义”的影响。^[12]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看到了一个在生态批评内部抵抗理论的历史,一个齐声唱赞歌的生态批评的历史,^[13]庇护着“一些摇摇欲坠的传统”。^[14]常被人看作态度蛮横的达纳·菲利普斯(Dana Phillips)最近声称,对于理论的抵制“使生态批评家在其学术同行中处于理论和哲学的边缘”。^[15]

菲利普斯并不是唯一持此观点的人。另一位学者苏西·欧伯瑞(Susie O'Brien)也认为,相对于后殖民理论所做的努力,生态批评并没有考虑到文学模仿能力所带来的幻

[6] 参见 Kit Stolz, “Ecophobia: A Paradigm”, *A Change in the Wind*, 25 (November 2005), http://achangeinthewind.typepad.com/achangeinthewind/2005/11/ecophobia_a_par.html.

[7] Terry Gifford, “Recent Critiques of Ecocriticism”, *New Formations: A Journal of Culture/Theory/Politics*, 64 (Spring 2008), p. 15.

[8] 目前的书,如安妮·麦瑞尔·英格拉姆(Annie Merrill Ingram)等编撰的《形成接触:生态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反映了接触的愿望。

[9] “真实之复兴”这一短语来自查琳·斯普瑞特纳克(Charlene Spretnak)1999年出版的著作标题《真实之复兴:极度现代世界中的身体、自然和地方》。

[10] Lawrence Buell, *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Oxford: Blackwell, 2005, p. 3.

[11] Karl Kroeber, *Ec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 Romantic Imagining and the Biology of Mi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

[12] Glen A. Love, “Revaluing Nature: Toward an Ecological Criticism”, in Cheryl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m eds.,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p. 236.

[13] Michael P. Cohen, “Blues in the Green: Ecocriticism under Critique”, *Environmental History*, 9.1 (January 2004), p. 20.

[14] Dana Phillips, *The Truth of Ecology: Natur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in Ame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ix.

[15] Dana Phillips, “Ecocriticism, Ecopoetics, and a Creed Outworn”, *New Formations: A Journal of Culture/Theory/Politics*, 64 (Spring 2008), p. 38.

想的危险性。她的思考值得在此详尽引述，因为她告诉我们：自己与一些学术同行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凭借了后结构主义的洞察力，后殖民理论已经通过对存在于所有公认的代表性文本之间以及存在于其内部固有矛盾的强调，削弱了殖民主义的文化根基，从而指出了遵守任何一个声称自己能清晰地反映世界的文化结构理论（包括后殖民主义和生态学）的行为都是危险的。^[16]

我们感到惊讶：为什么生态批评放弃学术争鸣的挑战？当有人声称“自然，和我们所谈论的别的事物一样，首先是一种语言的假象[……]它绝不是直接和表面的含义”^[17]时，生态批评并没有做出回应。艾伦·刘（Alan Liu）在1993年提出的著名的（抑或是臭名昭著的）评论“没有自然，只有历史”，引起了轩然大波，可也只是对于内尔·艾文登（Neil Evernden）一年前的评论“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自然’，从来就没有”^[18]的响应罢了。毫无疑问，彼得·魁格利有理由在1999年声称，“对于后结构主义的挑战，美国环境研究学界的反应并不能令人满意。在后结构主义之后，我们不可能只考虑像‘自然’这样术语的表面价值；不可能看不到有关这个术语纵横交错的矛盾的裂痕以及历史性的错误论断”。^[19]这些论调继续存在，但我怀疑生态批评对于理论抵制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如瑟皮尔·奥珀门（Serpil Oppermann）所说的“担心落入对自然纯粹的文本主义研究和形成建构一个阐释模板，从而偏离对文学中所强调的环境问题的探讨”^[20]，而是由于为了回避激进主义这个棘手的话题。这样也就引发了生态批评本身的一个基本问题——激进主义的动机及倾向。

生态批评将自身塑造为激进主义。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文学与环境项目的成员评论道：“至少许多生态批评家认为自己是环境激进主义者。”正是这种激进主义的倾向使得生态批评话语呈现出一种刻不容缓性及接触美学的特点；正是激进主义的冲动赋予我们的言语以紧迫感，为我们的聚会增添风采；也正是激进者的雄心壮志将我们与那些当世界慢慢走向末日却还整日刻板地陷于无用沉思中的专题研究者们区别开来。像许多早

[16] Susie O'Brien, "‘Back to the World’: Reading Ecocriticism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 in Helen Tiffin ed., *Five Emus to the King of Siam: Environment and Empire*, New York: Rodopi, 2007, p. 194.

[17] William Chaloupka and R. McGreggor Cawley, "The Great Wild Hope: Nature, Environmentalism, and the Open Secret", in Jane Bennett and William Chaloupka eds.,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Language, Politics, and Environmen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 5.

[18] Neil Evernden, *The Social Creation of Natur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99.

[19] Peter Quigley, "Nature as Dangerous Space", in Éric Darier ed., *Discourses of the Environment*, Oxford: Blackwell, 1999, p. 182.

[20] Serpil Oppermann, "Theorizing Ecocriticism: Toward a Postmodern Ecocritical Practice", *ISLE*, Vol. 13, No. 2 (Summer 2006), p. 115.

先的“政治”理论一样,生态批评在其萌芽阶段是激进的,但现在却似乎发展成了别的事物。早期生态批评的开放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已变得喜忧参半:尽管这种开放性帮助其在学术界立足或获得可信度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却导致了生态批评在“做什么”或“要做什么”方面的不确定性。借用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有意破坏帮》(*The Monkey Wrench Gang*)中撒维斯博士的一句话,“我们将边走边将其全部解决”。在此,边界似乎模糊了。可以肯定,如果说生态批评已经开始走向没落的话,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不能充分将自身理论化;二是不能遵循最初的激进主义抱负。正如朗斯·纽曼(Lance Newman)所指出的:生态批评在“改变社会的理想化理论和研究文学与自然关系的现实方法”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21]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我们都未能成功地处理生态批评激进主义的难题。这对于生态批评的领域与环境都不是一个吉兆。我们被错觉所蒙蔽,认为:理论与实践是相冲突的;理论不会带来公共政策的改变,而且对于“现实世界”来说是没有任何益处的。

哲学家们早已将棘手的问题理论化,早已设法解决道德责任及自然环境的问题,然而一些20世纪后期的哲学论断——尽管远没有摆脱实用主义及激进主义的影响,却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关于将道德责任延伸到动物界的论著已经极大地影响了大公司经营业务的方式。辛格正确地指出,虽然“有些人对道德论辩对于实际生活的影响表示怀疑”^[22],但事实上哲学家们确实有深远的影响,已经“成为动物权利运动的推波助澜者”^[23]，“出于对动物公共利益[……]的关心,整个工业都正在经历一场变革”^[24]。美容业寻找其他的替代品来代替动物做试验,公众对于毛皮的需求大幅度锐减。特别是工厂化饲养的问题,已从一开始的被边缘化,被看作是疯狂的想法而不置可否,变成在北美和欧洲受到大众关注的中心问题。这些都已成为普遍现象。

利用动物的工业企业是造成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辛格这种激进思想的影响恐怕要高过所有的生态批评家。他为建立与环境和谐发展的商业以及消费主义伦理观铺平了道路。最重要的是,他使得对道德的思考不仅仅局限于人类范围内,因而极大地影响了政府的政策制定。辛格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是他系统地定义阐述了“物种歧视”——对于“本物种中成员利益的袒护,以及对其他物种成员的歧

[21] Lance Newman, “Marxism and Ecocriticism”, *ISLE*, Vol. 9, No. 2 (Summer 2002), p. 14.

[22] Peter Singer, *Ethics and Animals*, Korea Press Foundation Seminar Series, Keimyung University, Seongseo Campus, Taejon, South Kore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May 18, 2007, p. 12.

[23] James Jasper and Dorothy Nelkin, *The Animal Rights Crusade: The Growth of a Moral Protest*,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p. 90.

[24] Peter Singer, *Ethics and Animals*, Korea Press Foundation Seminar Series, Keimyung University, Seongseo Campus, Taejon, South Kore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May 18, 2007, p. 16.

视”，^[25]但他对道德考虑的延伸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论的偏见。他将知觉力作为评价的界限，而这一界限是在逐渐复杂的有机体系的等级制度之内的，是“从植物到动物，[……]从神经中枢到大脑，从知觉能力到自我意识的”，^[26]是以人类中心主义本体论为利益的。

然而，我们现在有关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争论在某些方面似乎有些离题（或许它甚至不是一个可争论的问题），因为如不能合理地保护自然环境势必会引起人类的灾难，因此，也就意味着“即使在以人类为中心的道德框架内，对于环境的保护也可能是最具有重要价值的事”。^[27]然而，以这样一种方式引证辛格并不意味着接受他将承受痛苦和知觉能力作为检验伦理道德标准的信条。事实上，辛格的实用主义倾向将发展环境伦理排除在外，因为它所依赖的恰恰是首先会产生问题的理论——一种不可靠的对生命等级的伦理认同——将知觉能力高的生命形式置于伦理关怀的顶端，知觉能力不发达的置于伦理关怀的底端，而缺乏知觉能力的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实用主义哲学通常有这样的缺点：对于欲望或认识到的需求的满足是实用主义哲学的核心，将这些置于伦理系统的核心势必将没有知觉能力的实际存在物排除在伦理关怀的范畴之外。毫无疑问，辛格所声称的“需要……新的道德标准”^[28]是对的，但让他提供抑或甚至接受这样一种道德标准却是不可能的。其实，辛格关于环境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以植物为基础的饮食”^[29]的论证是合理的。但是生态批评家们及环境学家们经常对此观点予以忽视。

2007年春，我有幸见到辛格并与他谈到了这个问题：目前普遍存在着缺乏足够的词汇来描述人类对自然环境偏见的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伦理关怀范围的需要。然而，他当时的回答以及后来在我们邮件交流中所表达的观点是令人失望的。他认为“不太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我认为需要把对自然环境作用感到恐惧和蔑视的这种想法理论化。^[30]

如果生态批评承诺建立联系，那么它也将承认：对自然的控制，在西方文化中被看作上帝赋予的一项权利，意味着生态恐惧。正如使用非洲奴隶意味着种族主义，强

[25] 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A New Ethics for Our Treatment of Animals*, New York: Discus, 1975, p. 15.

[26] Holmes Rolston III, "Disvalues in Nature", *The Monist*, 75 (1992), p. 271.

[27] Peter Singer, *Practic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68.

[28] *Ibid.*, p. 286.

[29] *Ibid.*, p. 288.

[30] 生态恐惧并不是我们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唯一特点。这还是一个未被涉足的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其反义词应是爱德华·O·威尔森（Edward O. Wilson）所提出的“热爱自然”，即“人类本能地对其他生命有机物有一种亲密的情感”。司各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也指出，“生态批评其实是由人类亲自然的本能所推动的”。无可否认，热爱自然的确是激发生态批评发展的动力，但它却不是生态批评探究的目标。这种探寻必须在核心内容中包含生态恐惧及其如何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中可清楚地看到人类对生态的恐惧最终胜出了对自然的热爱。虽然威尔森的述说雄辩有力，但我们知道物种“快速消失”的主要原因是生态恐惧，绝不是热爱自然。

奸罪意味着对女人的厌恶,“对同性恋使用暴力”则意味着对同性恋的厌恶和恐惧,对动物的剥削意味着物种歧视。如果生态批评致力于建立联系,那么它也将承认这些问题(生态恐惧、种族主义、厌恶女人、对同性恋的厌恶和恐惧以及物种歧视)都完全地交织在一起,最终必须被一起看待。

然而,将“生态恐惧”这个术语理论化意味着要审视它在历史上的建构时刻。即它给予我们圣经般的指令来控制所有活着的一切。当然,“控制”在此是关键词。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似乎我们越是对自然环境有更多的控制,其实我们就越没有控制力。正如内尔·勒威(Neil Levy)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并没有掌控非人类世界,因为无法准确地预测我们的行为对其产生的影响”^[31],而且这种行为的影响越来越激烈和不可预测,不过反过来却产生了可以预料到的有关生态恐惧修辞的大量涌现。

对于生态恐惧这一术语,生态批评需要非常广阔的范围。临床心理学用同样的术语来指对家的毫无理由的恐惧。在生态批评中,这一术语是独立的,并非由心理学及精神病学中的方法导出。^[32]生态恐惧是一种非理性的和无根据的对于自然界的憎恨,就像对同性恋的恐惧和厌恶、种族主义及性别歧视主义一样,微妙地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学作品中。它发生在许多领域:它支持了个人卫生以及美容业的发展(这些行业把自然的“不足”与“缺点”列为他们工作的目标);它支持有权负责罚款的城市公共卫生委员会,在市政思想指导下清除害虫和杂草;它维持了美容师和理发师行业的发展;它隐藏于美丽的花园和首尔地铁上女士手提包中修剪得体的卷毛狗里。生态恐惧有关权力和控制,意味着对动物和非动物资源可能的掠夺。同样地,自我饥饿与自我毁伤也意味着生态恐惧,这与处死黑人的私刑意味着种族歧视没什么区别。

在哲学基础上细化生态恐惧是一件重要而又艰难的工作。以对生态批评有意义但又在哲学上不显得幼稚的方式将生态恐惧理论化,意味着对有害/讨厌问题的处理。令人惊奇的是,在生态批评的讨论中,此项研究进行得甚少。阿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在他所提出的令人赞赏的“大地伦理学”中,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将伦理道德的关怀扩展到整个大地。他声称,“当一个事物倾向于保持整个生态群落的美丽、完

[31] Neil Levy, “Foucault’s Unnatural Ecology”, in Éric Darier ed., *Discourses of the Environment*, Oxford: Blackwell, 1999, p. 210.

[32] 罗伯特·凡·泰恩(Robert Van Tine)提出了类似的术语“盖亚恐惧”(Galeophobia, 一种对自然进行极度破坏的疯狂形式,并对破坏性的行为后果加以病态的否认。<http://www.ecopsychology.org/journal/gatherings2/robin.htm>)。虽然根据《神经错乱诊断及统计指南》所列的病理学症状来确认其对自然环境的态度(有时候相当机械)具有潜在的有用性,但从泰恩的文章来看似乎夭折了,在任何我能找到的学术著作中都没有对此提及。虽然有些令人沮丧,但其学术成就还是很重要的。它表明了我在此探讨的理论性阐述已经在生态心理学领域被看作是必要的。我的方法是交汇的:在不放弃对蔑视自然环境的病态行为进行生态心理分析的前提下,更偏重哲学层面上的探讨。

整和稳定时，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33] 这个观点听起来不错，但它缺乏哲学层面上的依据和科学依据。它迫使我们重复谈论与“美”相关的问题，暗示着生态系统是静态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它迫使我们相信大自然是友好而和善的，而事实上自然是中立的。自然总在不断破坏生态群的完整和稳定，这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利奥波德的宣言迫使我们接受他的以人类为中心出发的优劣观点，并将此观点强加于自然。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在1992年发表的文章《自然的贬值》中所采用的方法稍有不同。罗尔斯顿对于自然中邪恶问题的哲学式探讨是这方面的第一次尝试，一直以来非常有用，并将继续使人受益匪浅，因而受到非常激烈的讨论和质疑。从他的探讨中发展出来的一个最鲜明的观点就是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生态系统整体范围内是好的事情，或许而且经常在局部（个体层面）就变成了坏事：“被吃掉是坏事；是死亡的结果。”^[34] 在个体层面上比在整个系统层面上要糟糕得多。实用主义者也同样宣称，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比少数人的利益重要。

从历史上来看（如果允许我来回应并修正一下利奥波德的观点），当某事物使我们兴旺发达时，就被认为是正确的，但当某事物导致我们死亡，或当它们已经（或者我们想象它们已经）阻碍、威胁或伤害了我们时，就被认为是不正确的。将自然看作是伤害、阻碍、威胁或导致我们死亡的敌人——不顾生态系统所代表动态作用的哲学价值或负面价值——正是生态恐惧症。罗尔斯顿著作中所引发的问题是：自然是否是邪恶的（或邪恶能否自然化）。^[35] 当然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这直接回到了奥古斯汀的观点：邪恶是人类构建出的，与我们的想象相关。

对自然中糟糕的一面进行想象并宣传这种想象——简言之，写作“生态恐惧”——是如此多面的事情，很难知道是从哪里开始的。例如，对于伊丽莎白时期的读者，他们对于谷物短缺、庄稼歉收、寒冷的天气以及猛烈的暴风雨非常熟悉。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到一些对生态恐惧的描写，像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这部戏剧的生动性体现在它突出了环境的无法预测性，刻画了一个在自然面前无能为力的国王形象——被天气所俘虏的国王、无家可归、格格不入。对于那些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荧屏所吸引的全球观众来说，他们对于极地冰川融化、全球变暖、卡特里娜飓风现象非常熟悉，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我们的媒体每日将自然描述成一个充满敌意的对手，生气地对人类入侵自然的行为做出回应。自然成为令人恐惧的对手，只有靠运气才能得以控制。

[33] Aldo 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pp. 224-225.

[34] Holmes Rolston III, “Disvalues in Nature”, *The Monist*, 75 (1992), p. 253.

[35] 这两个问题碰巧都是对罗尔斯顿回应的文章标题的变体：威纳·奥德克尔克（Wayne Ouderkirk）的《自然是邪恶的么》和吉姆·齐尼（Jim Cheney）的《将邪恶问题自然化》。

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对自然环境的控制史,是用岩石制成工具或武器来改变部分自然或消灭部分自然的历史,是建造遮蔽物来保护我们免受天气及捕食性动物伤害的历史,是保持个人卫生以保护我们免受疾病和可以致命的寄生虫袭击的历史。我们是第一个对自然充满想象和关注的,但随后又放弃了那种对自然的想象和专注。自然变成了需要我们控制的令人憎恶的目标,如果失去控制,自然只会成为令人厌恶和担心的事物,从而导致悲剧的发生(如在《李尔王》和卡特里娜飓风中)。对自然的控制意味着对于圣经判例的争论,如弗朗西斯·培根认为,自然为人类而存在,“如果我们寻求最终的起因,人类可以被看作是世界的中心;因为如果把人类从这个世界抽取出去,其他的一切就会乱套,漫无目的”^[36]。正如基斯·托马斯(Keith Thomas)所指出的,“对于培根来说,科学的目的就是重新恢复人类在堕落时丧失的统治造物的部分权力”^[37]。这与近期评价我们与自然关联的观点迥然不同。例如,克里斯托弗·梅恩斯(Christopher Manes)争论道,“如果在人类价值尺度上最‘低等’的生命形式真菌明天灭绝的话,其影响对于生物圈中的其他生物来说便是灾难性的;相反,如果消失的是人,该事件则几乎不会被地球上大多数生命形式所注意”。^{[38][39]}如果被梅恩斯所称作的“生态谦卑”是生态批评的一个特征的话,那么,生态恐惧就是人类进步的一个特征。^[40]

将生态恐惧理论化至少需要对其历史进行一些讨论。^[41]虽然生态恐惧在《旧约》中有一段著名的论断,但生态恐惧肯定不是起源于那时。它应该可以追溯到人类大拇指的进化时期,它使得人类能够制造工具,并在九千多年前就征用了“麦子、大麦、豌豆、小扁豆、驴、绵羊、猪、山羊等”。^[42]在现代早期时候,很显然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变。毫无疑问,15世纪的航海运动以及随后的帝国建立对此产生了最显著的历史性变化。

[36] Francis Bacon, *The Essays*, John Pitcher ed., New York: Penguin, 1986, p. 270.

[37] Keith Thomas, *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Changing Attitudes in England, 1500–1800*, London: Allen Lane, 1983, p. 27.

[38] Christopher Manes, “Nature and Silence”, in Cheryl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m eds.,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p. 24.

[39] 这个话题开始变得逐渐市场化。随着动物星球/发现频道联合推出CGI系列《未来是野性的》(2003)、阿兰·魏斯曼的2007年出版的图书《没有我们的世界》、历史频道的《人类之后的生活》以及国家地理频道的《人类消失后的世界》(2008年1月和3月),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展现了一个隐含的生态恐惧观点:自然最终会征服人类,收回世界上的一切,在我们消失之后它将长存。

[40] Christopher Manes, “Nature and Silence”, in Cheryl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m eds.,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p. 17.

[41] 在生态批评出现之前,事实上已有一些出色的学者清晰地讨论了“对自然的统治”这一话题,如William Leiss、Neil Evernden、Theodore Roszak等。

[42] Alfred W.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1.

帝国主义间接促成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对于自然的控制。世界变小了，可用图表示，可以预测，没有从前多样化了。随着殖民主义者的到来，出现了疾病、灭绝、同化作用以及人类对世界控制的巨大改变。虽然对于自然的浪漫化使得自然被看作是纯朴、天真和宁静的空间 [正如雷蒙·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所指出的“乡村”特征]，但却没有使得生态恐惧的发展缓慢下来，正如“高尚的野蛮人”并没有减缓对于殖民地人民的种族灭绝一般。

在跨海航行和殖民主义之后又很快出现了工业革命。至此，对于自然的控制被固定下来。由工业革命所引起的众多典型的转变和困境之一就是对于自然的重新定义——自然从参与主体和有机群体的有机物转化到纯粹的客体，成为一架可以被密切的、永久控制的理想机器，被迫为不断发展的实用资本主义经济服务而生产出产品。

尽管我们总可以找出掘地派和平等派成员以及对于西方生态恐惧霸权的零星抵抗，而且也无可否认在人类内部有种喜爱生物的冲动，但历史对于绿色思想家们和修正主义者并不友好。甚至在当今对环境问题重新感兴趣的年代，我们仍会继续听到一些关于生态恐惧语言层面的病态联系，例如将自然世界看作被惹怒的自然母亲；我们仍会继续看到生态恐惧态度的多变性，将自然看作社会问题的替罪羊（如那种过度拥挤以及由此引起的疾病）；也还会继续看到：那些把自己塑造成解决方法的人，正积极地抵制事实上可以引导我们走向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法。

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尽管目前没有一个“统一支配的世界观”^[43]来规定生态批评的实践，但是生态批评仍需要更多的结构和方法论上的确定，而不是混淆和含混不清地多方向发展。除非生态批评着手处理所涉及广阔领域内的矛盾性——也就是说将其关注的中心问题——生态恐惧理论化，否则它将前途渺茫。就像女性主义批评若不将性别歧视及厌恶女性等问题理论化，其前途也是受限制的。从方法论上来讲，这意味着生态批评家对于文本分析——不论是文学还是非文学层面的——不仅需要特定文本的文化史和思想史有细致入微的探讨，还要把这种讨论延伸到以下层面：有关文本的环境史及情况；作者每日所呼吸的、闻着的、品尝体味着的环境；生存的困境、悲剧及其原因。虽然此处不是应用该方法讨论的适合场所，但至少我们可以看一眼如何运用它。

例如，使用生态批评的方法分析《李尔王》，就需要去看“小冰期”，以及它怎样搅乱了人类想象中的权威和控制作用。需要指出，根据考古学家布莱恩·费根 (Brian Fagan) 的研究，“在 16 世纪后半期，暴风雨活动增加了 85%”^[44]，我们需要对小冰期进

[43] Scott Slovic, "Letter", *PMLA*, Vol. 114, No. 5 (October 1999), p. 1102.

[44] Brian Fagan, *The Little Ice Age: How Climate Change Made History, 1300-1850*,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p. 91.

行描述(现在已经有很多相关记载,甚至已超越了文学研究领域),并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在整个欧洲,从1560年到1600年气候更加寒冷,暴风雨更多,有后来的葡萄酒丰收和比20世纪更猛烈的大风。”我们应该可以在莎士比亚有关的文本中找到这一信息,^[45]同时也需注意到“天气变得更难预测,气候突然变化多端,低温状况到16世纪后半期达到了高潮”^[46]，“随着气候情况的恶化,致命的不幸降临到了欧洲人身上”^[47]。这就是莎士比亚所看到的外部环境情形。上述观点与史蒂芬·格林布莱特的看法既有差异,又有共通之处。格林布莱特认为在《李尔王》这部剧中,“莎士比亚环视了他周围的日常世界”^[48]。但他没有确切地提到当时的天气如何困扰莎士比亚,而《李尔王》中对天气的强烈突出和特性描述正反映了该时期的实质蕴含。

在一定范围内,若不对生态批评研究的领域或边界进行限定(其无限制的开放已变得具有矛盾性而成为不利因素),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可存活下去的生态批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要限制其批评的疆界;同样地,就像提名休·赫夫纳(Hugh Hefner)为女性主义者对于女性主义批评的前途来说是有问题的。提出可行的生态批评意味着接纳一种心照不宣的学术协议。如果它带有性别歧视,就不可能成为生态批评,因为性别歧视与生态批评的精神、目标及远见背道而驰。这并不是意味着生态批评总是积极的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当然很不错,但那似乎要求有点高。类似地,如果以环境为导向的批评显示出种族主义或对同性恋的厌恶,那么它也不是生态批评,原因同上。当然,生态批评也不需要积极地显示出一种寻求反种族主义或反厌恶同性恋的样子,但总需要我们去促进种族主义,或在文化、种族、宗教、性及地理基础上形成偏执。生态批评越是在其自身理论化的过程中与其他激进的理论相融合,它的发展前景就越好。

当然,碍于篇幅,在此不好给出一个扩展的实例来说明理论是如何进行融合交汇的,但迅速浏览一下其可能的轮廓在此是合适的——而且,我们没有选择具有明显“环境倾向的”文本,因为那样可能不像选取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更有说服力。

如果生态批评使《李尔王》中所呈现的对环境的不可预测性的极度恐惧显得有意义,并将戏剧中充满敌意的可怕的环境描写置于上下文去研究生态恐惧,那么同样也可以研究《科里奥兰纳斯》。在该剧中依旧假设了这一主题,身份的危机根植于环境的危机——涉及声音、性和地方的争辩。简单地回顾一下这部剧,就会发现该剧以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环境危机“饥荒”开始。反叛使得科里奥兰纳斯没有了耐心。当然,圈地法案

[45] Ibid., p. 90.

[46] Ibid., p. xvi.

[47] Ibid., p. 91.

[48] Stephen Greenblatt, *Will in the World: How 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 New York: Norton, 2004, p. 357.